

20世纪青年成才
之路丛书

人
才
学

下



RENGAIXUE

20世纪青年成才之路丛书

人 才 学

(下册)

史仲文 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世纪青年成才之路丛书

人文学

(下册)

史仲文 编著

新华书店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125 印张 169.001 字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100

统一书号：4166·889 定价：1.75 元

目 录

第四章 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外在因素	(1)
第一节 人才成长、发展与大环境.....	(2)
第二节 人才成长、发展与亚环境.....	(43)
第三节 人才成长、发展与小环境.....	(72)
第四节 人才成长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109)
第五章 建立完善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人才制度	(115)
第一节 人才发展战略.....	(115)
第二节 人才培养.....	(145)
第三节 人才选拔与人才管理.....	(181)
第四节 共产主义理论与人才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211)

第四章 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外在因素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条件，外因对于事物的变化，自然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关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外在因素，很多人才理论工作者作过详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过一些非常形象化、理论化的见解，如人一时关系，人一地关系，人一人关系，人一物关系等，并把这些关系看成子系统，统一放在人一境关系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进行考察。人才成长的外在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又处在不同的层次和结构当中，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其实，我们还可以比照前例举出一些属于子系统范畴的内容，如人一法关系，人一言(社会舆论)关系，人一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人一人才群体的关系等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们都用单一的两个字来表示，也不能硬造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新鲜词组，因此，暂且把人才的外在因素分作三个方面，即人才成长、发展与大环境，人才成长、发展与亚环境，人才成长、发展与小环境。最后说一说人才成长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等到人才外在因素的一些提法约定俗成以后，再考虑用更为简洁的方法给予表述。有一个图表(见图 15)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人才成长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与这个图表表现的内容大致相似。

第一节 人才成长、发展与大环境

所谓大环境，是指整个社会环境及发展趋势、水平、性质和状态（见图14）。

一、人才涨落与国势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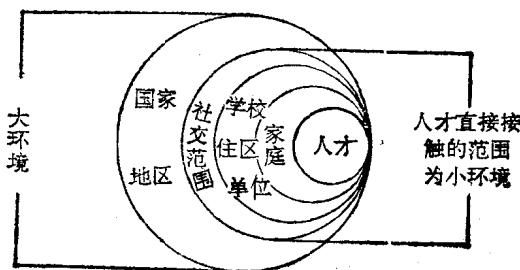


图 14

(一) 社会环境对人才成长发展的巨大影响

我们在人才发展规律的客观描述一节中，分析过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三种形态，即波峰时期、波谷时期和过渡时期。这些时期的更替，借用耗散结构理论的说法，算为人才的“涨落”。社会人才群的涨落与国势的盛衰有直接关系，人才群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或者被败坏，得不到正常发展，出现人才寂寞，都与整个社会的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人才发展规律受社会发展规律约束，社会发展规律又受其内部各种因素消长变化机制的制约。这些机制的变化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这些机制的科学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已经在理论上得到基本解决。国势昌盛，则人才辈出；国势衰微，则人才不兴。

所谓国势衰微则人才不兴，当然不是说一个人才也没有

了，而是说大部分人才成长的社会机遇被断送了。战乱时期，也有人才，但是经济被破坏了，各行各业都处于极其动荡的环境下，教育、理论、生产、技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而与消费、娱乐、文艺密切相关的行业，更是首当其冲，变成畸形发展状态。战乱期间也有文艺，也有诗人，也有文化教育，但战乱时期的文化毕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文 化，而且战乱与战乱也有不同。象东晋十六国那样的大战乱，对于任何事业无疑都是强烈的打击和毁坏。进步的因素，统一的因素只是在战乱中慢慢求其发展。在战乱局面中，不知道毁灭了多少人才。我们没有把东晋十六国时期和盛唐时期人才发展情况进行详细的比较，但是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人才不知比东晋十六国时期要多上多少倍，这是可以推测到的。举例说，战火纷飞的年代，建筑业能发展吗？到处火光冲天，土崩瓦解，建筑人才衰落了。学校能发展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正常生活乃至生命都没有保障，哪个还顾得学习？于是教育人才衰落了，下一代人才培养也耽误了。吃且无食，用复何为，观赏则成为梦话，手工业艺术的发展自然也断绝了生路，多少杰出的艺人为糊口奔忙，饥肠如鼓，求生无门，艺术已经不值钱，只得靠出卖劳动或者乞讨才能勉强糊口，于是手工业急剧衰败，手工业人才后继无人，很多高超的技艺散失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可以动员民众，同仇敌忾，产生伟大的战争文艺和同样伟大的战争艺术。在正义战争、进步战争和爱国战争的洪流里，多少好男儿成为名垂千古的杰出人才。但是战争时期毕竟是一种非常时期，人才个体的全面、正常的发展必定受到影响和阻碍。正义战争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打垮反动的统治、压迫和侵略，以暂时的牺牲为人才的发展挣来光明的前途。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对象的人类发展史，是如此广阔和久远，而人才个体只有那

非常宝贵和短暂的一次生命，任何历史瞬间的耽搁都会造成人才终生的不幸。人才个体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才的坚韧性能在世间最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居里夫人关于镭的试验，全凭两只手在一间破屋子里劳作，其工作量即使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也会为之胆寒。华子良在敌人“魔窟”中装疯，其毅力更是令人高山仰止，无以复加。但另一方面，人才的成长又表现出相当严重的衰弱性。一个人才的成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人才的培养和智力开发则仅仅限于他的幼儿、少儿和青年期这么短短的时间，一经耽搁万事皆空。因此，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十年生育，十年准备”，就可出现比较昌盛的社会局面。而一个坏的社会环境，“十年准备，十年发难”，社会给千百万人带来无可挽救的巨大损失。陈毅青年时期到法国勤工俭学，其时正值“中法秘密借款”刚刚炮制出来，恰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所谓“秘密借款”，就是北洋政府以出让中国铁路修筑权等一系列权益为条件，向法国帝国主义借一大笔钱，用来买枪买炮，供军阀势力镇压人民。因为其内容丧权辱国太甚，害怕遭到国内舆论反对，只好秘密进行。消息传出，民情大哗，留学生更是怒不可遏，陈毅作为留法学生代表，去会见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双方展开一场唇枪舌剑。陈毅说：“我作为中国人，替你们感到羞耻。”这位公使被刺痛了。他回答说：“中国是弱国啊，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外交这话深深地印在陈毅的心里。说这话的人虽然缺少作为中国人应该有的爱国志向和民族气节，是一块软骨头，但他也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一条道理：弱国无外交，国弱被人欺。国势衰弱，恰如一个羸弱不堪的母亲，她很难生产和培养出强健聪慧的儿女。弱国缺少人才，即使有了人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会由于种种原因遭受挫折、打击以至覆灭性灾难，或者被驱赶到穷乡僻壤中去，

终致一筹莫展，壮志空余。

(二) 适应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因素

适宜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包括：安定的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形势，正确的治国方略和人才政策，相当的科学技术基础以及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尚等等。这些因素中，安定的政治局面是最主要的，而合理的社会制度又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特别重要的社会因素，那么，西方社会制度合理吗？如果说不合理，但它确实出现了很多的人才。中国社会制度本来是非常先进的制度，为什么又会出现“十年动乱”那样的浩劫呢？这个问题好解释，合理的制度是就其社会矛盾运动的平衡程度而言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其本身都存在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在平衡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中发展和转化，其结局或者因其不平衡达到极点，发生暴力革命；或者实现自我调解，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前者，如法国封建社会败亡、资本主义诞生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更是典型的例子，后者实例不多，但中国西藏的民族政策，可以看作在这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从逻辑上说，就是共产主义的到来以后，还会采取这种形式。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来看，其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基本因素之间，并没有达到无法调和的极端不平衡状态。它的社会制度，对于它的历史发展，借用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来说，其合理性特征并非丧失殆尽，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其人才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相当雄厚的基础。而对于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民族，强盛国家。这不但为历史所证明，而且为现实所证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一切比较公道地看问题的国际友人也大都持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过去却存有偏见，好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有了一切。现在平心

细论，这个看法是错了。社会主义不是供人享乐的温床，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又是一种需要全体人民为其奋斗的国家体制。不错，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幸福提供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基本保障，但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既是革命先烈和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那么，它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人民继续奋斗努力工作。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形式，有适合国家特点的经济体制和分配方法，有适合于社会基础的发展规划及近、中、远期的奋斗目标。合理的社会中各种基本因素的不平衡也是依然存在的。虽然它的这种不平衡的性质与旧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处理不好，也会闹出乱子。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是社会的人才群成长和发展的肥地沃土，但是，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健全的法制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才能使这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丰硕的果实和绚丽的花朵。

(三) 进步的社会制度在国势盛衰中的决定力量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脱尽其合理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又可能出现基本社会因素的不平衡，那么，人们要问，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适宜人才群的成长和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适宜人才群的成长和发展呢？

我们认为，就历史而论，东方落后的封建主义、殖民地国家，其出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民族独立之路。因此，资本主义在这里没有发展的依据和可能性。就现实而论，社会主义虽然有种种不完善的地方，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的先进性就表现在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摒弃了旧社会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因此，它虽

然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却从本质上代表向上发展的一种社会力量。而资本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领域内，虽然有它的优势，但是作为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说，已经失去了昔日革命的特征，而逐渐走向了没落的道路。资产阶级曾以革命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有自己的伟大建树，现在在科学技术上依然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但是这已经是最后的繁荣与昌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产业革命的迅速到来，必定引资本主义走上新的十字路口，或者因其政治制度的没落，而被统治阶级不承认不准许其没落，从而带来某种革命，或者因生产的高度发展引起和平的政治变革。列宁作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科学分析，其对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其总的理论精神来看，至今仍有不容轻视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其未来何去何从，还要看其社会内部的基因变化而定。但是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它还有种种缺点。中国在对内政策上，吃过大亏，现在醒悟过来，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正在走上一条非常宽广而又非常健康的道路。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本质上代表了进步，如果能够采取适合社会现状的合理政策，必将发出无比的威力。社会进步是人才发展的最根本的保证，因为人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最积极的力量。任何环境，即使共产主义的社会环境，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进步的社会环境必定会造成社会人才群产生的波峰时期。古罗马和古希腊，就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汉唐时代有过这样的时期；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过这样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前进也必然会迎来这样的辉煌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在我国已经可以看到其微茫的曙光。历史对我们的要求，就

在于让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或者更长一些时候的努力，把它变成美好的现实。

二、人才成长与国家政策

(一) 人才辈出，政策是关键

政策当中，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策”，或者说基本政策。它包括路线、基本方针和主要的政策等内容。国策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确定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的社会意志的集中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是带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不过分的。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来看，政策尤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社会主义不是一句随随便便冲口而出的口号，它有复杂的社会内容和远大的目标及其丰富多采、千变万化的现实性特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正确的政策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依然需要正确的政策作指导。而正确的政策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正确判断和估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基本依靠对象是谁？有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占据怎样的地位？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来源于对这些问题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正确的政策来源于对现实的正确认识，而正确的政策一旦确定，又会对这些现实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政策的内容很多，如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等，其中也包括人才政策。没有正确的基本政策，不可能产生正确的人才政策，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有了正确的国策，未必自然而然地产生正确的人才政策。正确的人才政策，有它自己的规

律。它从属于基本国策，又以自己的独特内容丰富和充实正确的国策。它在政治国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人才辈出的波峰时期，当然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作基础。但是，和人才关系最密切、最具直接影响的还是政策，特别是基本国策。由于实行的政策正确与否，可以出现人才的波峰期，也可以出现人才波谷期。同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政策不同，可以出现“十年动乱”那样的大错误，也可以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繁荣局面。由此可以看出，人才辈出，政策是关键。

（二）开明的人才政策的基本要求

人才政策包括的内容很多，而且政策常常处在不断地丰富、变化和调整当中。当然所谓变化和调整是依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不是依某些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定。这一点，下面还要论述。就一般人才政策的内容来说，有三点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际要求。

1. 民主的学术空气。民主空气，对于人才的成长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条件，全等于零。以中国古代历史而论，思想上、理论上最辉煌的时期首推先秦。其影响之大，非汉、唐所及。先秦时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是诸子百家争鸣，有一个比较开放和民主的学术环境。孔、孟、荀、墨、韩、老、庄，诸子百家，各展所长。没有文字狱，也没有因为观点不同、理论不合而杀头的事情。诸侯以至皇帝对于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持比较尊重的态度。士人可以流动，楚国不用，而去魏国，魏国不用，又去秦国。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只有先秦时期比较好些。其学术著作也影响深远。西汉既不能比，盛唐也大有逊色，虽然汉、唐文化的整体水平超过先秦。没有民主空气，革命

的、先进的东西往往会被压迫和窒息。进入近代以后，五四时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和革命的浪潮冲决叠起的时代。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非只言片语可以概括。五四运动开其先河，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发生了伟大的革命，而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又启迪和推动了政治革命，终于使腐败落后的旧中国，成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出了毛泽东、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杰出的人才群体。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开创的思想解放、学术发展的局面，则不可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人才代表和人才群体。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社会既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产生出超过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人才辈出的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愿望在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并没有真正出现。中国的京剧界出了裘盛戎，客观地评价，他是解放以后才真正取得自己的艺术成就的。中国评剧界有新凤霞，她也是解放以后才得以大展其才的优秀演员。中国数学界出了陈景润，他是新中国培养的。中国文化界也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但是风云变幻，多有不测，加上错误的方针和一些坏人从中渔利，使本来应该出现的思想界、文化界、科技界的繁荣局面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十年动乱”这样令人痛心的结果。中国人民有数千年封建主义兴衰的历史经验，有100多年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经验，又有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科学领域、文化领域中民主空气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最为深刻的理解。

自然，民主空气绝不是放弃教育、批评和领导，也不等于任意发展，各行其是。其实，即使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之间的批评也是非常激烈的，当时的统治者和一般士人对于各种学派也有自己的选择，并非不加分析地胡乱采纳和盲从。秦朝的建

立，以法家的学说为根本，以至秦始皇见到韩非的著作，感叹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孔子办学，为少正卯所苦，孔门弟子“三盈三虚”。可以想见当权者和一般士人的选择自由，非常活跃。可是，今天一些人接受十年动乱的错误的教训，不敢进行争鸣；专喜栽花，生怕添刺；这是对于双百方针的一种误解，只能形成所谓的“民主空气”。双百方针的真正作用在于，一方面它可以保护学术争论的正常进行，一方面它又可以保护批评的正常进行，用科学的手段、民主的方法达到学术研究和学术筛选的目的。何况，社会上、思想界和文化界错误的东西很多，内部的、外来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不容半点忽视。双百方针的适用范畴，应该明确地规定在学术范围之内。对于那些低级下流的东西，那些有害的东西，统统应该算在取缔范围之内。国家机关，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对它进行揭露、批判、告发和抵制的责任与义务。

2. 必要的政治地位。人才必须要有必要的政治地位，首先是人才不被歧视，不受压制和不受打击。“十年动乱”期间，把知识分子划为“臭老九”的做法就是一种政治歧视，把一切有学问、有建树的人统统划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代表，就是一种政治压迫。用极“左”路线的大棒对于人才乱打一通是最不得人心，最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策。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种政策也应该寿终正寝。

政治地位，一般地说来，是与其他各阶层人士平等的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体现了这种地位。

对于知识分子和一切人才，应该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照顾。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一般说来，要比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更大一些。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还受一定限制，国家还要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还会存在。由于各种客观条

件的限制，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还无法一下子得到普及。对于那些受教育较多、文化较深、能力较高的人，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条件，对于国家建设、对于人民生活根本改善都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人才是国家之宝，对于“宝物”给一点特殊的待遇，有什么不好呢？以美国为例，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对于人才历来是非常爱护的，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人才，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吸引、收买甚至攫取。《环球》杂志有一篇《美国对人才的攫夺》的文章，对美国的人才政策，作了一番描述。文章说：“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而在引进和使用外国的人才方面，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采取尽量罗致的政策。”30年代，曾经有两千名欧洲著名科学家为逃避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而背井离乡。美国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研究工作必需的各种条件和环境，吸引其中多数人移居美国。他们之中有被称为相对论之父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意大利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等。1945年美军占领德国期间，美国特别重视罗致当地的科技人才。当时在纳粹德国陆军试验站负责研制V-2火箭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和另外120多名德国火箭专家，全部被美军送往美国。战后，美国政府为争夺科技人才，曾在1952年和1965年先后两次修订移民法，优先批准各种专门人才入境。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在1949年至1973年期间，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16万人。美国的人才政策固然有它种种的阶级局限性，但是资本主义能够做到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正确的人才政策，应当把发挥人才作用放在第一位。人才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创造力量。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的目的，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北京晚报》曾以《科技人才最需要的是有用

武之地》为题，报道了北京微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又有三项产品通过鉴定，为国家填补了空白和解决了急需。这个仅有200多人的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已开设科研课题40项，通过鉴定8项，添置了15台价值6.3万元的仪器，年纯收入82.4万元。报道说，建所初期，由于该所实行所长负责的科研有偿合同制，国家不拨事业费，因而科研经费、流动资金分文没有，必要的仪器设备没有1台。但所领导坚信“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最需要的不是金钱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是可供其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施展才能的事业。”他们同心同德，在建所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收回科研费47万元。这个所的领导对记者说，这个研究所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鼓舞人心的成绩，“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结果。”

给人才以发挥才能的宝贵机遇，也许比给金钱更能使他们舒心、愉快。千里马之所以为千里马，它要在万里草原驰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3. 正确的分配原则。正确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按其贡献的大小给予不同的劳动报酬的原则。讲到劳动报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劳动量的计算上面应有所区别。很多脑力劳动是无法以数量来计算其价值的。一个搬运工一天搬几千斤、上万斤、几万斤，那是有数量标准的，但一本著作，有时便只有几千字，却是千古不朽的名作。这个价值怎么计算？殊不知“千古文章”里面包含多少心血在内。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多大价值？李密的《陈情表》有多大价值？恐怕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计算出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主义出版商给的那么一点点报酬，连支付写《资本论》时买雪茄烟的钱都不够。脑力劳动者可以创造出无价的产品，很可惜只能以有价的形式向他们偿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得的偿付是太少了。